

任 乃 强

民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55431

责任编辑：丁师浩
选 编 者：任新建
封面设计：刘家峰

任 乃 强
民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 字数：420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册 定价：5.85元
ISBN 7—105—00836—9/K·68

(汉27)

出版说明

长期以来，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事民族科学的研究，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发展民族科学的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是我国民族科学的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老一辈民族研究工作者在民族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陆续编辑出版《民族研究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能促进民族科学的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套《文集》是个人论文选编，不是全部论文汇集。所选论文力求体现老一辈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凡已出版的长篇专著均不收入。所收论文基本局限于作者在民族科学的研究方面，涉及其它学科的除个别外，一般均不收入。

这套《文集》中所收论文在编排上以写作或发表日期的先后为序。内容上不做重大修改，只在个别文字上作些订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的还做了题解和注释。题解在各篇第一页下边，注释附在篇末。

自序

余自束发受书，偏嗜地理。时惟旧制中学，课目繁赜，须兼习俱优，获前三名，方可免食学杂费。余苦于家贫，力争各科满分，克以毕业。并获师友资助，赴京深造。其时国内治地学者如杨守敬、白眉初、翁文灏等各树一帜，授徒开派。余虽就读于农学院，然遍求诸家之论著研习之。窃以为地学当为各科学之基础，盖万事万物莫不受时空之影响也。因是，由经济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转而跻身于历史地理学之研究，民族研究亦因此始。

1928年编写《四川史地》一书，发觉四川盆地曾于两晋间、宋元间、明清间发生人烟灭绝之劫三次。而究其原因，皆与人口极度膨胀，地不足以养民有关。以为预防之计，首当开发川边民族地区，消除边腹民族之扞隔及经济发展之差异。适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筹备开办川边垦务，招人考察。余乃毅然弃安适之生活，赴康考察。于是，得有长时间与土著各民族接触，研究其语言、历史、情俗以及生产消费、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各个方面，以历史地理学之方法，探究康藏民族之社会发展历史。钻研既深，兴趣愈浓。造次必于是，颠沛或未舍。六十年来，所有论著，莫不围绕康藏民族问题。然半途出家，于民族学基本知识初无所习，固不敢自诩为民族学者也。

解放以前习著颇多，每有所得，辄书以自藏，报刊、学友或有所命，即抽与之。或以所刊件相报；或因迁居失联系而无闻；或竟散失为人攘为已有。皆因埋头研究，未暇清理。解放后又因

被划右派故，不得发表著作二十余年，其间撰述多为长篇，缘总结平生心得，以待天明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获解放，陆续撰成若干中篇论著，俱已印行。九十岁后，手颤难以命笔，乃致力于典籍之考订校注，未敢有日暮途穷之念者，深感盛世难逢，余力当尽也。每思将过去散见于报刊之旧作收集整理，总因力不从心，未竟其事。蒙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将此列入专题，指派小儿整理选辑。自念孤陋寡闻，谬误难免，更苦于未及订正，一仍旧貌。故尤盼海内外专家指斥教正，以补不逮，爰以为序。

任乃强

1987年8月16日于成都
时年九十四岁

目 录

康藏名称及境域之变迁	(1)
康藏民族之由来及其细分	(14)
汉藏民族文化交流之历史印痕	(22)
康藏旧说纠谬	(31)
康藏史料中若干名称之正译	(45)
泸定考察记	(58)
吐蕃开国考	(117)
文成公主下嫁考	(122)
吐蕃音义考	(137)
唐蕃甥舅和盟碑考	(144)
松赞干布年谱	(159)
“藏三国”的初步介绍	(181)
附：关于“藏三国”	
喇嘛教派释名	(197)
附国非吐蕃	
——与岑仲勉先生商榷	(205)
隋唐之女国	(212)
记西藏热振事变	(236)
德格土司世谱	(242)
大积石山与俄洛藏族	(272)
——献与大积石山探测队	
从大禹生地说到边疆人物	(280)

四川第十六区民族之分布	(286)
天全土司世系考	(301)
关于羌族史中的几个问题	(319)
蚕丛考	(325)
达布人的族源问题	(334)
古代羌族文化简论	(359)
古羌族派分之民族	(376)
《吐蕃传》地名考释	(443)
巴族与食盐	(522)
 附录	(559)
作者小传	(559)
作者主要民族著述目录	(562)
编后记	(566)

康藏名称及境域之变迁*

(1933年)

一、土伯特四部与西藏四部

吐蕃极盛时，奄有今日西藏、青海、西康全部之地，与新疆、印度、缅甸、云南、四川、甘肃之一部，成为传统三百余年之大帝国。第九世纪末，帝国崩裂，各小部纷起自雄，互不相属，仅赖帝国培植之佛教，维系各部，成一民族团体，即所谓“土伯特”，清人呼为“唐古特”也。明末，厄鲁特蒙古固始汗征服土伯特全部，始分其地为四区：曰库库诺尔，汉译为青海，即今之青海省地；曰巴尔喀木，省称喀木，即今之西康；曰卫，亦作危，即今前藏之地；曰藏，即今后藏之地。雍正二年，年羹尧奏陈青海善后事宜疏云：“查青海、巴尔喀木、藏、危，乃唐古特四大部落。固始汗占据此地，以青海地宽大，可以牧养牲畜，喀木地方人众粮多，遂将伊子孙分居此二处。伊则在青海游牧居住。喀木地方为伊等纳贡。藏、危二处从前原施舍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香火。”^①（清人通称土伯特为唐古特，详后节。）魏源《圣武纪·抚绥西藏记》云：“初，唐古特有四部：东曰喀木，曰青海；西曰卫，曰藏。固始汗者，本厄鲁特部，于明季吞并东二部，以青海地广，令子孙游牧，而喀木输其赋。其卫地，则第巴奉达赖居之。藏地，则藏巴汗居之。第巴曰桑结者，与藏巴汗不

* 此为《西康图经·境域篇》之一章，原连载《新亚细亚月刊》1932—1933年。

相能，谓其残虐部众，毁黄教，乞师于固始汗剪灭之。以其地居班禅，与达赖分主二藏。尽逐红帽、花帽诸法王。事在崇德十年。”

此唐古特四部分析之历史也。唯此四部，并无明 确 疆 界。康、卫、青海间，七十九族之游牧地，究属青属康，皆未明白规定。（藏人习惯以此部为康）雍正二年，征服青海，同时收抚康地与宁番七十九游牧部族，始将康、卫、青海境界明白划清。唯又将康地分为二部：东部分属四川、云南，西部并卫藏之地，赏与达赖喇嘛，称为“西藏”。青海则归西宁镇守使管辖。其时达赖已经征服拉达克、噶尔大、罗多克等地方，称为阿里部。此乾隆《大清一统志》所以分西藏为康、卫、藏、阿里四部也。西藏四部之界至，《大清一统志》曾明白载出。兹转录如下：

“卫 在四川打箭炉西北三千余里。即乌斯藏也。番字乌加斯字，切音作‘卫’。居诸藏之中，亦名中藏。东自木鲁乌苏岸西海部落界（强按：雍正七年勘划青藏地界为当拉岭，此云木鲁乌苏，似系就支差地界言之），西至噶木巴拉岭藏界，一千五百三十三里。南至鄂木拉刚冲岭，北至牙尔佳藏布河，二千二百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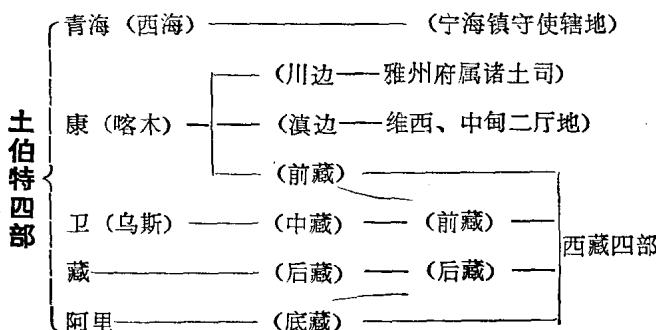
藏 在卫西南五百余里。东自噶木巴拉岭卫界，西至麻尔岳木岭阿里界，一千八百八十二里。南自帕里宗城之毕木拉岭，北至者巴部落之北打鲁克雨木撮池，一千三百余里。

喀木 在卫东南八百卅二里，近云南丽江府之北。东自雅龙江（即雅砻江）西岸，西至鲁卜公拉岭卫界，一千四百里。南至噶克拉冈里山，北至木鲁乌苏南岸，一千七百里。东南自云南塔城关，西北至索克宗城西海部落界，一千八百五十里。东北自西海部落界阿克多穆拉山，西南至色勒麻冈里山，一千五百里。

阿里 东自藏界麻尔岳木岭，西至巴第和木布岭二千一百余里。南自匝木萨喇岭，北至乌巴拉岭，一千三百余里。此西藏之边鄙也。”

其称青海为“西海”，康为“喀木”，系当时文书固皆作此称也。唯谓喀木东界至雅砻江则系采访之误。查康熙时，平定西炉以雅砻江之中渡为康炉分界。炉属四川，康属青海。迄雍正平定青海，遂以宁静山为四川西界（详后节）。宁静以西始为西藏之康部。《大清一统志》修于乾隆之世，不应尚援康熙旧界为文。兹特辨正。从来记康藏部分者，类有疵缪，固不仅此志为然。阅者宜细察之。

下表说明清代土伯特四部与西藏四部之关系。



二、最大之误译

通常译英、法文之Tibet为西藏，此大误也。“西藏”二字，作为我国之行政区域名称，始于雍、乾之世。其时所指，为宁静山以西，青海以南之康、卫、藏、阿里四部。清末，边务大臣赵尔丰收回赏藏之康地，请于江达与西藏划界。旋由代理边务大臣傅嵩林请以丹达山以东之地建西康省。民初，以其地为川边特别区域。是今之“西藏”二字，又只能包括卫、藏、阿里三部。至于Tibet一字，乃土伯特之转译。土伯特为亚欧各民族加于藏族之称呼，同时施于其所分布之地。故凡今卫、藏、青海，及西康

之地，西人皆称曰Tibet或Tibetan，犹之称我国新疆省（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俄属中亚细亚为Turke或Turkestan也。

英人查理·贝尔者，侵略西藏之最猛进者也。所著《土伯特之过去与现在》一书(Tibet Past and Present)，附有土伯特地图二幅，用重线圈出土伯特境界，竟包有西藏、青海、西康之全部。近世绘西藏地图者，竞相翻译之，勾绘境界，亦仿此图。张其昀氏所著高中地理教科书之西藏地图，乃亦如此摩绘。《新时代史地丛书》之《西藏问题》一册，所冠之西藏地位图，亦如此勾绘。谓非中国学术界之奇误乎？究其致误之由，只在译义未明，相沿日久，耳熟口滑，出之不觉耳。

当西姆拉会议时，查理·贝尔教西藏代表尽力预备争界之书证，达赖从其教，大肆搜集，捆载赴会；开议日，直指藏境东至雅州，提出书证甚多，中国代表陈贻范瞠目不能驳一语，只摇头否认而已。我国人素昧边事，不知先占地步，临事拮据，甘于失败，固不独陈氏为然也。假使若干年后，再有类似西姆拉会议发生，达赖竟执我国名流所编审之图书为据，以争青海、西康，国人将以何词拒之耶？

余以为Tibet一字应直译为“土伯特”。“西藏”二字，亦应先自介绍于西人，译为Hsi—Tsang。或依西人现有译名为Tsang Po（藏播），愿国人亟采纳之！

三、藏族名称沿革

中国史籍，对于藏族称呼，屡有更易。周秦曰“戎”，汉魏曰“羌”，唐宋曰“吐蕃”。元明称其地曰“乌斯藏”，其人曰“番”。清初，称其地、其人皆曰“土伯特”或“图伯特”。雍、乾后，称其地曰“西藏”，其人曰“唐古特”。清末，分其地为康、藏、青海三部，称其人曰“藏番”。民国肇建，始称藏

族。其人自称“博巴”，亦曰“博闵”。蒙古、土耳其、波斯、印度、缅甸人皆称“图伯特”(Tubot)。阿拉伯人曰“第伯特”(Tebot)。欧美人曰“底伯特”(Tibet)。皆“吐蕃”之转音也。

四、戎、氐、羌解

《王制》云：“西方曰戎”。谓陇西荷戈行猎之民族也。戎外之地，称之为“羌”。《说文》云：“西方牧羊人也”。当时所知羌、戎地界，要不出今甘肃、青海之间。其著名部落曰“畎夷”（即犬戎也），曰余无之戎、六济之戎、邦冀之戎、义渠之戎、犬荔之戎、杨拒、泉皋之戎、蛮氏之戎、骊戎、阴戎等等。多以地称。戎地距中夏最近，故于三代之书，屡有记载。秦灭戎，置陇西北地诸郡，戎人化为“中国”，其名始废。羌地距中夏远，古称“鬼方。”《汉书音义》曰：“鬼方，远方也。”武丁征鬼方，三年克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②《竹书纪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所谓鬼戎即鬼方也，为今青海省地。翟，古狄字，时有北狄、月氏种，属居羌地，故曰：“氐羌”，故所俘曰“翟王”。其后月氏西徙葱岭之西，即大月氏也。遗留之种，为小月氏。汉以后，氐羌融合。其徙居陇蜀之间者，为白马氐，亦曰白马羌。自仇池杨氏死后，氐皆汉化。故唐以来，氐名消灭。唯羌种转渐强盛，屡犯西边，为两汉二大边患之一。下历魏、晋、周、隋，强酋迭起，势未稍衰。唐初，吐蕃起于逻些，并吞诸羌部，为一大帝国，复为唐代四大边患之一。自是以后，华夏人皆称羌地曰“吐蕃”。羌字亦复废矣。

古时华夏人，只称青海湖附近之牧民为“羌”。其后渐知柴达木低地之游牧部落，亦称为“羌”。后汉时，渐知西康高原之

游牧部落，亦称为“羌”，隋时，又渐知西藏高原之游牧部落，亦称为“羌”。即吐蕃，被认为羌种。

今藏人称西藏北方大高原曰“羌塘”依藏文解释：北方曰“羌”，平旷荒寒之野曰“塘”，似与汉文之“羌”字无关，故有译作“张塘”或“绛塘”者。然余以为译作羌塘为是。因此带地方牧部，在未有藏文以前，即被呼为“羌”。藏文系唐初时神圣赞普松赞干布取印度文参合西藏土语所创制。其称北方为“羌”，或系取羌人在其北方之义也。

五、土伯特解

土伯特者，吐蕃之异译也。查蕃字，通常读附袁切，音烦。亦作蒲麌切，音“波”。（见《集韵》）。古音波、伯相近。俱似“不”音。古译国名，通常只截首二音。是“吐蕃”二字，当读“土波”，为“土伯特”之省译。宋以来失古音，始读作“土番”也。吐蕃极盛时，南并印度、缅甸之一部，东曾破唐都，据有陇西之地。西北奄有天山南北路，与阿拉伯国（即天方国）接壤。征骑屡出，邻国震惧，故凡亚洲各国，莫不知之。阿拉伯人爱斯特里于十六世纪末叶著书称之为“妥巴特”（Tobat），其后转译为“第伯特”（Tebot）。阿拉伯人之书流行欧洲，辗转翻译，字画屡变，音亦微异，至于近世，始作“底伯特”（Tibet）。亦犹中原之写读“吐蕃”为“土番”也。

华人称藏族为“土伯特”，始于清初。清室未入关前，已先绥抚蒙古。时蒙古笃信喇嘛教，奉拉萨之达赖喇嘛为活佛，屡请清帝迎致之，谓能降福。清太宗崇德四年，遣使聘于拉萨，从蒙古语，称其国曰“土伯特”。由是，使节往还，聘报不绝。清既入关，曾延达赖来京说法。其时官书，称为“土伯特主来朝”是也。

顾“土伯特”之名，藏人殊不自知。康熙以后，西藏用兵，交接频繁，数询藏人以土伯特命名之义，藏人皆不自承。时人觉此名称为不当，始有“西藏”、“西招”、“唐古特”等异称蜂起。雍、乾以后，“土伯特”之名，亦寝废矣。藏人所以自忘其土伯特之名称者，盖因吐蕃崩亡甚早（约在宋初），藏人又多不习史（西藏政府禁人习史），现存史籍，多属关于宗教之事，不甚注重其政局变迁，对于前朝，每多忘去。譬如内地未学人民，外人或呼汉人为“唐人”、“蒙古利亚人”，则亦摇首非之，是也。

东西洋学者解释“土伯特”名义，颇多曲说。如英人爱第巴喀、日人寺本等，皆谓土伯特之“伯特”，为“波得”（Bod）之转音。梵语“波得”，为觉或佛陀之义。西藏人民信佛，常以“波得”自诩，故其古昔，号“土波得”，转译而成“土伯特”也。初聆之颇觉有理。细思：吐蕃为神圣赞普之国号，明载《唐书》。“妥巴特”为第五世纪末叶藏地之国名，见于爱斯特里之书。第六世纪之初，藏地尚无佛教，则“土伯特”一字，与“波得”何关乎？古今字音变革甚大，若辄忘相牵引，则谓吐蕃为舐毫吐子之俦所蕃衍可乎？

中原人对于译名，亦多曲解。如谓犬戎为犬之后裔，交趾人脚趾交合之类，不可胜举。《旧唐书》谓吐蕃为秃发之转音，赞普为赞府之义，殊可发笑。若果如此，则史臣何不直译为赞府，为秃发乎？若谓当时吐蕃文字，原如此写，则是吐蕃未忘汉文，又何不自称为秃发，为赞府乎？大抵宋代去唐已远，修史者未知唐时读音为“吐波”，只疑其为秃发氏之后，遂有此曲解也。

六、唐古特解

唐古特，青海南方羌族部落名。亦作“唐兀惕”（见《元朝秘史》）。明末世以之称呼青海住牧之羌族全体。厄鲁特侵入青

海，唐古特尽受约束，仿佛清朝之入主中土。厄鲁特无国号，故汉人每以唐古特呼之。雍正二年，年羹尧奏陈青海善后十三条，谓“青海巴尔喀木、藏、危，为唐古特四大部落”是也。当时尚多称羌、蕃两族为“土伯特”，故此名不甚通用。乾嘉之世，土伯特名渐废，此称始大通行。《乾隆一统志》尚并存“图伯特”（即土伯特）与“唐古特”二名，嘉庆初，驻藏大臣和琳，撰《西藏赋》，遂曰“土伯特其旧名，唐古特其今号”。嘉庆以后，概称藏文为“唐古特文”，藏兵为“唐古特兵”矣。

七、乌斯藏解

元世祖至元六年，置乌斯藏宣抚使，分其地为郡县，以帝师大宝法王八思巴领之。^⑧ 乌斯藏之名始于此。乌斯藏者，卫藏两部之合称。藏文卫部作“卫巴”，省称曰“卫”，“中央”之义也。其字系二音拼合：曰乌，曰斯，故其促读为“卫”，缓读为“乌斯”。藏部为“藏巴”，省称曰“藏”，“清洁”之义也。合二部为一，故曰“乌斯藏”，犹合洞庭湖附近与广东西地为一省，曰湖广，合甘州、肃州地为一省曰甘肃。皆元制也。上海曹树翘著《乌斯藏考》，竟以乌斯藏为古之姑臧，其穿凿可笑如此。

八、西藏解

臧河即雅鲁藏布江，其名见《唐书·吐蕃传》。今藏人称曰“藏波”，“清洁”之义也。英译为“藏普”（Tsan—Po）。臧、藏同音，故可称为藏河。卫藏两部，皆属藏河流域，在中国西部，故清代称旧乌斯藏地为“西藏”。其名初见于康熙平定青海碑，与果亲王之《西藏记》，皆不过偶加西字于藏，以喻其

远。实则当时通称，仍为“图伯特”也。平定西藏碑之文，凡三称“图伯特”，只一称“西藏”。《西藏记》则曰“西藏一隅……明日乌斯藏，今曰‘图伯特’或‘唐古特’。”足见西藏两字，那时尚不通用。不过既经帝王拟用，遂得通行官书。至乾隆时，正名派驻图伯特之大臣曰驻藏大臣，西藏之名，由是固定。其后《清一统志》有《西藏篇》，魏源撰《抚绥西藏记》，龚自著《西藏纪略》，西藏之称，不绝于简册矣。

当西藏名称尚未固定时，撰述之士，竞标异名，以炫世俗。要皆微有所本。兹集考附丽于此：

诏地 康熙五十九年，噶尔弼奏陈军事疏，屡称拉萨为“诏地”。盖其时西藏政教分治，达赖所居为布达拉，藏王（第巴）所居为“诏”，准噶尔策旺阿那布坦遣其台吉策零敦多布攻据藏地后，主持诏政。清军攻贼扶教，故不曰“图伯特”而曰“诏”也。

招地 康熙平定西藏碑文，云“噶勒招地”。招地亦拉萨也。招、诏同音，藏文当是一字，译写不同耳。又，康熙五十九年上谕，释招为如来，故“招地”，亦可释为“佛地”也。

西竺 雍正时，毛振翻著《西征记》云“西藏僻在荒徼，……古号‘西竺’，未识何据，大约以其人奉佛，比之于天竺耳。

西招 嘉庆时，驻藏大臣松筠，撰《西招图略》一书，论西藏厄塞险要，盖取康熙“招地”之称，冠以西字；以为招、藏音近，一字两译，而不知语源各异也。

西域 乾、嘉时，有旗人七十一者，著《西域闻见录》，所言皆藏事也。嘉庆《四川通志》之《西藏篇》亦称为“西域”。

卫藏 乾隆五十七年，大学士福康安奏折，有“筹议卫藏章程”一条，即改革西藏官制之嚆矢。其后盛纯祖辑《卫藏图识》，和琳撰《卫藏通志》，皆为记藏事者最佳之书。卫藏即乌斯藏之简译也。